

政治意识形态

规约下的

文学话语

——《金光大道》话语分析

ZHENGZHUYISHIXINGTAIGUIYUEXIADWENXUEHUA YU

连晓霞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政治意识形态 规约下的 文学话语

——《金光大道》话语分析

连晓霞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文学话语:《金光大道》话语
分析/连晓霞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 8
ISBN 978 - 7 - 215 - 06954 - 1

I. 政… II. 连… III. 长篇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
代 IV. I207. 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255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70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序

当海登·怀特向人们展示历史修辞化的学术图景时，一个颠覆性的认知前提是历史的意识形态化。作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等学术文本，让人们重新思考历史真实论的逻辑基础。

客观存在的历史的意识形态化，是在叙述层面实现的。当存在着的历史进入叙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悄悄地接受了历史存在的意识形态表述。而当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进入再叙述的时候，史学家追求的对历史真实地还原，又会产生新的距离。

有意味的是：人们通常愿意相信，在抗拒意识形态渗透方面，历史比文学更有优势。但近年的学术风景却显示：历史学界部分地接受了历史意识形态化的认知挑战，文学界则一度传出了“告别意识形态”的声音。

几乎不能抗拒意识形态介入的文学领域，爆出了淡化意识形态的声音，也许反向地传递出一种信息：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中，文学书写的“文学性”曾经遭遇意识形态的强势监控。《金光大道》产生于这样的文学生态环境，这决定了连晓霞写作的诸多困难——

在消费时代的文学话语场，选择意识形态话题，意味着将要面对部分读者的政治疲劳，乃至抵触性阅读。

在众多小说家中，选择浩然作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冒险。浩然曾是

特定历史时期官方意识形态选中的独秀小说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浩然现象和作家颇具政治色彩的角色身份,给学术研究淡化意识形态的中性写作增加了难度。

浩然一生创作文学作品 70 余种,1000 多万字。争议最大的作品,可能就是《金光大道》。选择《金光大道》作为研究对象,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话语循环。《金光大道》接受史本身就可以描画出一条清晰的意识形态介入曲线: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肯定性接受,到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否定与肯定并存的接受,再到 90 年代中期《金光大道》重版和完整出版引起的不同接受反应,《金光大道》一直是引发学术论争的文本。90 年代末,浩然本人宣称“无悔”的创作,加剧了围绕《金光大道》的笔墨之战。

因此,连晓霞打算借用意识形态批评和广义修辞学理论,对《金光大道》做话语分析的博士论文构想,得到过善意而明智的提醒:这个题目不好做。

但是,写作角度有时是从正视难度发现的。

存在写作难度,不等于关闭写作空间。梳理现有研究成果,连晓霞读出了前期同类研究的价值和局限,并从现有研究的局限入手,寻找尽可能减少重复性研究的可能性。

文学以语言的方式而存在,悬搁文学语言的文学批评是《金光大道》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而这,正是连晓霞再出发的起点。

这也是她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定位。学位论文于 2007 年通过答辩。眼前的书稿,是学位论文的修改稿。

书稿以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文学话语为观察点,分析《金光大道》的话语方式,认为显性政治意识形态文本艺术含量的判定应围绕所处意识形态语境进行话语分析,为此,书稿的写作重心是:审视作家的修辞策略、话语权力,文本的话语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深层规约与互动。依次分析意识形态蕴涵与小说语言的意识形态化、本土化语言的修辞特色、政治审美中的叙述话语模式、政治语境中的人物对话以及政治话语对文本艺术价值的遮蔽与消解,构建了一个既重视同类研究成

果,又有别于同类研究套路的论述框架。书稿显示,原著阅读充分,观察细致。把握语言事实与论题关系较准确,解析有理有据,时有新见。就整体的学术面貌而言,本书是文学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个案,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广义修辞学的诠释与思考。

书稿重新评说了《金光大道》文本话语中的政治含量和艺术含量,也分析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作家的艺术限制和文本中的语言硬伤。

后者主要体现在第五章:政治话语在人物对话中的越位、政治激情对家庭温情的修辞改造,使得小说人物之间的情感对话异化为政治宣言,覆盖了政治神话人物的“本我”。政治修饰语的使用密度及冗余信息,使得本已被民族化、大众化的乡村话语稀释的政治浓度再度变浓。口号式感叹句的运用,使得英雄话语的句子形式挤压了语义内容。书稿写作的中性立场和局部的量化分析增加了信度。

书稿部分章节是在福建师范大学完成的,其间,连晚霞有时几天不下研究生宿舍楼,买上够吃几天的简单食品,单调的饮食和单调的阅读与写作相伴,她没有觉得亏了自己。把自己关在浮躁、悠闲与潇洒之外,甚至在人们走亲访友最频繁的春节,她也中断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但没有中断与浩然在《金光大道》的字里行间相约。

媒体报道浩然辞世的第二天,连晚霞打来电话,说是想在书稿的后记中写几句话,表示对这位农民作家应有的尊重。其实,就本书而言,后记的特别交代也许是形式大于内容。生长在中原农村的连晚霞,与浩然的精神交谈,已经记录在书中。

有人说装修是遗憾的艺术,写作又何尝不是遗憾的艺术?不过,一分遗憾的收获,可能是一种召唤——重要的是在遗憾中激发自我提升的动能,重要的是带着新的感悟进入下一次写作。

谭学纯

2008年3月于福建师大

目 录

导 言	1
一、现有有关《金光大道》研究的五个阶段	1
(一)全面肯定阶段——70年代“文革”时期的研究	2
(二)否定与肯定并存阶段——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研究	3
(三)再版和完整出版引起的争议阶段——90年代中期的研究	5
(四)“无悔”创作引起的争议阶段——90年代末期的研究	7
(五)趋向学理的评价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的研究	15
二、现有研究的价值和局限	23
(一)价值	23
(二)局限	25
三、本书写作的观察点和理论资源	32
(一)本书写作的观察点	32
(二)理论资源	36
第一章 意识形态蕴涵与小说语言的意识形态化	41
第一节 意识形态蕴涵及其中国表征	41

一、意识形态蕴涵及功能	41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表征	45
第二节 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文学语言的意识形态化	49
一、意识形态:文学的价值取向	49
二、意识形态的语言呈现	60
三、《金光大道》的意识形态化语言	64
第二章 本土化语言的修辞特色成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民间亲和力	79
第一节 本土化语言的句子结构加强了文本的政治宣传功能	80
一、“板块”结构	81
二、偶句结构	100
第二节 俗谚俗语提升了文本政治宣教的艺术性	109
一、由道德伦理规范上升到政治理念	110
二、由生活常识上升为政治认知	115
三、由语言艺术上升为政治艺术	118
第三章 政治审美中的叙述话语	127
第一节 政治意识形态观照下的第三人称叙述	128
一、政治审美中的时空表达模式	130
二、政治审美中的人物描写模式	136
三、细节中的意识形态焦点	141
四、政治议论中的意识形态信念	151
第二节 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修辞幻象	157
一、情态修饰语中的修辞幻象	157
二、政治激情中的修辞幻象	163
第三节 主流话语中的生活言说	168
一、对中间、落后人物的温情调侃	168

二、政治狂欢中的爱情描述	172
三、与主流话语交响的生活叙说	176
第四章 政治语境中的人物对话和角色认知	184
第一节 信念对话中的角色认知	186
一、政治话语的年龄模式	187
二、政治话语的身份模式	200
第二节 伦理对话中的角色认知	211
一、政治伦理对话中的角色认知	212
二、生活伦理对话中的角色认知	224
第三节 解说性对话中的角色认知	229
一、对人物的解说	230
二、对思想内容的解说	238
第五章 政治话语对文本艺术价值的遮蔽和消解	250
第一节 政治“神话”对人物角色“本我”性的遮蔽	250
一、政治话语在人物对话中的越位	251
二、政治修饰语的多余	256
三、口号式的话语对人物本性的遮蔽	262
第二节 政治说教对叙述话语的艺术性的消解	268
一、生硬议论对艺术真实性的消解	269
二、冗余议论对细节合理性的消解	276
附录一	284
附录二	287
参考书目	295
后记	309

导 言

在“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创作中,浩然作为唯一公开的、进行个体创作的“一个作家”,《金光大道》作为那个时期公开发行的政治色彩浓厚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曾经拥有的辉煌、曾经引起的争议,以及将会引起的话题,都会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本书立足于文本产生的主观与客观、意识形态与语言、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表达与接受等四种关系,以广义修辞学、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功能语言学等为理论基础,从小说语言的意识形态化、本土化语言的修辞特色、政治审美中的叙述话语模式、政治语境中的人物对话以及政治话语对文本艺术价值的遮蔽和消解等五个方面,对这部长篇小说进行全面、深入的话语分析,力图以理性、客观的态度,考察政治意识形态对《金光大道》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艺术上的成败得失。

一、现有有关《金光大道》研究的五个阶段

自《金光大道》第一、二部分别于1972年、1974年问世,到1994年全四部完整出版,20年的完整出版史使这部长篇小说及其作者浩然成为当代文坛的焦点,尤其是1994年再版以来,对这部作品及其作者的褒贬之争一直是当代评论界一桩难断的“官司”。根据评论焦点的变化,笔者把以往30多年来的研究和争议分为五个阶段。

本书导言的第二部分将专门讨论现有同类研究的价值与局限,因

此这一部分只对《金光大道》的有关研究现状作现象描述。

(一)全面肯定阶段——70年代“文革”时期的研究

《金光大道》一、二部分别于1972年、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了当时多家报刊的关注,评论者大都从正面给予作品充分的肯定和称赞。这些肯定和赞扬之声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作品的思想成就的肯定。如鲍定文的《向着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前进——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见《光明日报》1972年8月28日)、金玫的《农村斗争生活的画卷——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见《人民日报》1972年10月28日)、郎华和陆石的《急流勇进战旗红——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见《文汇报》1972年12月8日)、任轶的《必由之路——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二部》(见《人民日报》1974年12月26日)、党文兵的《〈金光大道〉第二部的重要成就》(见《求是学刊》1975年第3期)等文章都从内容方面肯定了作品的思想成就。

第二,对高大泉形象的肯定和赞扬。麓山草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读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见《解放军报》1972年12月6日)、姚大如《浅谈〈金光大道〉中高大泉形象的塑造》(见《安徽大学学报》1973年第11期)、黄炽《英雄时代的英雄典型——评〈金光大道〉第一、二部高大泉的形象塑造》(见《南京师院学报》1975年第1期)、段海燕《在矛盾斗争中塑造英雄典型的深刻启示——评〈金光大道〉第二部高大泉的形象》(见《南开大学学报》1975年第1期)、金梅和吴泰昌的《“打着火把的领头人”——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二部中高大泉英雄形象的塑造》(见《河北文艺》1975年2月号)、乐振国《略谈〈金光大道〉对人物的剖析》(见《求是学刊》1975年第3期)等,都主要从政治角度,正面肯定了高大泉这一人物形象的革命意义。

复旦大学中文系《金光大道》评论组的论著《〈金光大道〉评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则从综合角度全面肯定了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其内容目录主要有:

1. 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提炼与设置作品的矛盾冲突

2. 遵循典型化的创作原则塑造人物

(1)着力塑造高大泉这一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2)围绕主要英雄形象认真刻画其他人物。

(3)革命样板戏经验在小说中的成功运用。

3. 小说的思想成就与艺术特色

由于当时的文艺方针和作品歌颂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调,使得这个阶段的评论完全以一个声音说话,即从政治思想和艺术成就两方面都给予作家作品全面肯定,所以这个阶段的研究没有什么争议。

(二)否定与肯定并存阶段——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研究

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尤其是中央对农村政策的调整,文坛上开始出现否定《金光大道》的声音,如张炯、杨志杰在《新中国长篇小说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在“四人帮”控制文坛的十年中,产生了一批以“揪走资派”为创作题材的作品,他们认为:“主题先行,是非颠倒,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闭眼不看现实的真正黑暗,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唱赞歌,成了这类作品的共同色调。即使确有生活的作者,在‘四人帮’紧箍咒的桎梏下,也程度不同地走上瞒和骗的创作道路。浩然应该说是生活而又勤勉的作家,他善于描绘出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生动艺术图画。令人惋惜的是,从《艳阳天》起,便明显带有适应一时理论和政策宣传需要的倾向,在《金光大道》中这种倾向又有发展。县长谷新民俨然以‘走资派’的面目出现在这部长篇中,便是图解一时流行的理论和政策观念的直接结果。”^①

陈继会在论述中国乡土小说时,认为:“从一部分反映合作化的作品中批评个别人在思想上发家致富走资本主义道路,到《金光大道》中的以‘发家致富’作为农村社会中衡量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唯一标准,大写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假象蒙蔽了真实。‘虚热闹’被写成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理应是血肉之躯的农民,

① 张炯、杨志杰:《新中国长篇小说发展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

被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泉(高、大、全)式的人物所代替。中国现代作家在艰难选择中作出了难尽人意的选择。”^①

郭志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肯定了《万年青》、《金光大道》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可取之处,但同时又指出这类作品“艺术构思以及对自己所描写的生活的认识和评价,由于深深地打上了‘四人帮’反动思潮的烙印(把阶级斗争简单化,把路线是非搞颠倒;搞‘三突出’,过分强调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等),因而就严重损害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导致了許多不真实的描写,在读者中造成不好的影响,《金光大道》尤甚。”^②

但是,也有一些评论者对这部小说进行了部分肯定,尤其是在浩然沉寂多年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苍生》,并在1990年获得了“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后,引起了新时期以来文坛的重新关注。不少作家、评论家由《苍生》联系到《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将它们进行对比分析。如雷达的《旧轨与新机的缠结——从〈苍生〉返观浩然的创作道路》(《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周德生的《浩然图式——对浩然小说创作嬗变轨迹的描述和评价》(《创作论坛》1988年第1期)、孙达佑的《浩然创作心态》(《北京文学》1991年第9期)等,都对作品进行重新审视,部分肯定了其存在价值。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编写也没有忽视其存在价值,如郭志刚认为“作者尚有一些切实的生活感受,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也兼有某些可取之处”,“作品中较生动地描写了在建立和巩固集体经济的斗争中农村各阶层各色人等的精神状态及其相互关系,人物性格也比较鲜明”^③。陈其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指出其致命弱点的同时,也认为:“作品以华北地区芳草地村从土改后到合作化时期的生活和斗争为背景,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农村生活中的多种矛盾,充分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相。作品围绕农民同地主富农的

① 陈继会:《理性的消长——中国乡土小说综论》,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② 郭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③ 郭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阶级矛盾和农民内部、党组织内部的矛盾等线索展开情节,着力刻画了高大泉、周忠、刘祥、邓久宽、高二林、周士勤等农民的形象,比较生动地描写出他们身上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和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刻画了地主歪嘴子、漏划富农冯少怀、蜕变村长张金发、坏分子范克明等社会主义敌对势力代表的形象,比较传神地描写出他们的阶级本性和反动本质。作品通过冯少怀等人一心只顾个人发家致富并别有用心地趁机向贫下中农示威,支援抗美援朝、春播等一系列情节,比较全面地表现了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状况。”^①杨守森从理想人格精神层面肯定了高大泉形象的价值,“浩然是一位富于理想和热情的作家,他笔下的萧长春、甚至高大泉,尽管不同程度地有着那个特定时代的苍白印记,但他们作为特定时代人们仰慕的理想人格,至今还在许多读者心目中留着温馨的记忆。生活,的确是需要同一种理想人格精神的鼓舞的”^②。

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个阶段的研究不再是全面肯定的一种声音,随着对“极左”思想和路线的认识和纠正,文艺界也开始反省文学创作和评论中存在的问题,对《金光大道》这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产物进行重新审视,虽然评论者的立场、观点存在分歧,但总的来说还都是较为冷静的、客观的评价。

(三)再版和完整出版引起的争议阶段——90年代中期的研究

1994年《金光大道》全四部由京华出版社完整出版发行,由此掀起一场争议大波。与前两个阶段不同,这个阶段出现了完全否定和部分肯定两种声音。

1. 完全否定

持这种这种观点的人,大多对作品一、二部再版和三、四部的出版表示不满甚至愤慨,主观倾向明显,如艾青撰文指出:“作品虽然没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

① 陈其光:《中国当代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321页。

② 杨守森:《审美本体否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年代的‘路线斗争’。”^①还有人认为：“《金光大道》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只是为‘文革’历史唱赞歌，并认为作者缺乏基本的历史感与艺术感。”^②

何满子的《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开篇写道：“毛泽东曾说小资产阶级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的。其实，不仅小资产阶级，当年在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一统天下时期一花独放的《金光大道》的作者，总该是响当当的“左派”，属于无产阶级了吧；二十年过去了，久已被人唾弃的小说又推了出来，岂不是照样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吗？”^③文章把《金光大道》比作“劳什子”，“不过是死老虎一只，做一个标本或许是有用的”。全文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完全否定了这部长篇小说，对其再版和完整出版表示愤慨。

2. 部分肯定

对以上从政治角度来否定这部作品的批评，有的作家和评论家持不同的观点，对作品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肯定其价值，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张德祥在《金光大道》的再版前言《作为小说的〈金光大道〉》中，对这部作品作了较为宽容的分析，认为《金光大道》“表现了政治，但它又不仅仅表现了政治”。“这里有政治，也有生活；有观念，也有形象；有历史的真实，也有虚构的想象；有真实的感情及真诚的激情，也有虚妄的自信及乌托邦的信念；有流行过的豪言壮语，也有作家的生活感悟；有人形也有神影；有追求也有幻灭；有英雄主义也有利己主义等等。政治与生活、生活与艺术、道德与人格、理想与现实、国家与个人、进步与倒退、崇高与渺小、圣情与私欲等交错于此，非一言两语就能判明，任何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可能导致以偏赅全，导致狭隘或歧见。”在另一篇文章中，张德祥针对以上的批评，进一步指出：“以‘政治标准唯一’为价值标准，即，你《金光大道》产生于‘文革’时期，你‘应和’了极

① 艾青：《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文汇报》1994年10月29日。

② 杨扬：《痴迷与失误》，《文汇报》1994年11月13日。

③ 何满子：《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2期。

左政治,政治倾向性决定了你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如今已是90年代,这种陈旧的观念毕竟不能再决定作品的命运了,《金光大道》的重印和发行说明了历史的进步。”^①

王一川教授认为:“高大泉一方面是‘斗争哲学’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20世纪卡里斯马典型传统的一部分。指出头一方面并不难,难的是冷静地对待第二方面。单纯把高大泉的出世归咎于‘文革’时期的‘斗争哲学’,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论著显然是缺乏历史视界的结局。重要的是看到,高大泉的孕育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至少是世纪初以来我们的典型传统的延伸与变异的结果。”“因此,我们在思索高大泉这一卡里斯马典型的教训时,既要检讨‘斗争哲学’的迷悟,也要反省20世纪典型化传统本身。”^②

熊元义在回顾1995年文艺界几场较大的文艺论争(包括对《金光大道》再版的论争)后,认为:“尽管有些人声言要竭力回避政治,但是他们的批判或捍卫仍然是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场上。对于动摇他们的地位的批判者,他们是不惜从政治上进行讨伐的,甚至以他们的政治标准为唯一的衡量尺度。看来,思想解放仍然任重而道远。”^③

可以看出,在这个阶段反对与理解的争议都是围绕文本的政治性进行的,对文本的否定和肯定都从政治角度展开。从争议双方所执言辞上看,肯定一方的评价相对客观、理性,因此学术性也较强,对后起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四)“无悔”创作引起的争议阶段——90年代末期的研究

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发表了该报两位记者卢新宁、胡锡进对浩然的专访文章:《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文中浩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迄今为止,他从未为以前的作品感到后悔。相反,他感到骄

① 张德祥:《“神话”的创作与破产——“金光大道”现象及其他》,《文艺争鸣》1995年第4期。

② 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③ 熊元义:《可怕的栽赃》,《文艺报》1996年1月19日。

傲。他最喜欢《金光大道》；他认为，他在“文革”中是有贡献的，他正在写一部“文革回忆录”；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这篇文章再次引起了围绕浩然及其作品的争议。与上次争议不同的是，这次参加争论的人大大增加；争论的内容也不再是文本本身，作者浩然本人的人品也成为争论的焦点。

1. 否定性评价

从否定一方的观点看，贬损浩然的理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江青对他的特殊优待，说明了他就不能代表农民，甚至只能是条“狗”。如焦国标发文质问：“‘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出行有直升机，病了可住北京301（高干医院）。”“代表了农民什么？”“干了错事，因为出于自己的冲动和激情，他就可以被原谅么？他就从而没有错么？”^①

王彬彬《理解浩然》一文推测并断定：“想一想啊，一个只读过半年私塾和三年小学的人，居然获得那样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居然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唯一的作家’或‘首席作家’，居然就靠爬格子爬为‘女皇’的宠臣，这不都是那个时代所给予的吗？这不都是当年那种创作方法带来的吗？今天的浩然，有理由在清夜起坐时，一遍又一遍地感叹：那可真是一个好时候啊！既如此，要让他像那些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一样对那个时代心生痛恨，要让他像在那个时代遭放逐、遭摧残的作家那样对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念满腔憎恶，不是有些强人所难吗？”“最近，一家电视台在重播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电视剧里那个叫花子出身的小名‘狗儿’大名‘李卫’的人物，因被先前的四爷后来的皇上收留，在不会看状子时便做了知县，此后则步步高升，一直做到两江总督。他对‘主子’之忠到了把新生的儿子取名‘李忠四爷’的程度。他有一句话道：‘人不能忘本，四爷就是我的本！’这个人物也令我想到浩然。浩然也不能忘本。那对于无数人是噩梦一场的年代，恰是浩然的‘本’，那被无数人视作是妖孽毒蛇的‘女皇’，是浩然的

^① 焦国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6期。